

规范的重建

关于霍耐特的承认论



胡云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规范的重建

关于霍耐特的承认论

胡云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规范的重建:关于霍耐特的承认论/胡云峰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360-0

I. ①规… II. ①胡… III. ①霍耐特-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8104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晓阳

规范的重建:关于霍耐特的承认论

胡云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6 插页 4 字数 356,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360-0/B·1152

定价 60.00 元

规范的重建

关于霍耐特的承认论

如何理解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代序）

王凤才

“法兰克福学派”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而得名，以批判理论闻名于世；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社会研究所是法兰克福学派大本营，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标志性贡献；但并非社会研究所所有成员都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并非社会研究所所有理论成果都属于批判理论。例如，在格律贝格时期，既没有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批判理论；但他奉行的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法兰克福学派真正创始人、批判理论真正奠基人霍克海默尔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并非铁板一块，批判理论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着众多差异、矛盾甚至对立。尽管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总体上都属于“老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尽管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三条不同研究路径，但与“老批判理论”相比，基本上都属于“新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尽管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有着不同的学术取向，但总体上属于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标志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阶段（“后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趋向（“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是笔者长期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而做出的基本判断，已经得到了学界同仁的认同（尤其是得到了霍耐特的认同）。要想理解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首先要弄清楚“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尔、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批判；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

期哈贝马斯^[1]、A.施密特、F.V.弗里德堡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维尔默、奥菲等人为代表),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概言之,“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意味着:从古典理性主义到感性浪漫主义再到理性现实主义;从激进乐观主义到激进悲观主义再到保守乐观主义;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马克思主义;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往哲学再到政治道德哲学(“政治伦理学”);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后批判理论”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它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

一、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从社会哲学到批判理论

关于“社会哲学”(socialphilosophy/Sozialphilosophie),大致有三条不同的理解路向^[2]:

第一,本体论路向(典型形式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旨在从最抽象层面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该哲学的核心,由此而派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其社会哲学。当代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深刻分歧,但在将哲学当作关于实在的认识形式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它们对于社会哲学的理解,基本上也属于本体论路向。

第二,认识论路向(典型代表是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认为,社会哲学探讨各种不同的关于理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本质的观点;有时也提出一些关于美好生活或理想社会是由什么构成的设想;通常也关心关于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及其特征的评价,以此作为赞扬(有时仅仅是修

辞学上的)某种社会措施或社会计划有价值的理由。这一路向理解的社会哲学类似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

第三,社会理论路向(典型代表是社会科学家而非专业哲学家)认为,应该用“社会理论”概念取代“社会哲学”概念,并强调社会理论不能归属于任何一门特殊学科;相反,它涵盖了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因而,社会哲学问题亦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它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的哲学反思。

在霍克海默尔看来,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对并非仅仅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因此,它主要关心那些只有处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才能理解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社会哲学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3]就是说,社会哲学意味着要对人类文明进行反思、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对人类命运进行关注。霍克海默尔关于社会哲学的这种广义理解,尽管并不为社会研究所成员完全认同,但即使在批判理论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贯穿了其基本精神。

那么,什么是批判理论呢?这需要从“批判”一词谈起。根据《杜登德语通用辞典》(*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 Wörterbuch*)的说法,“批判”一词源于古希腊的 *Κριτική*,是指“评判的艺术”(Kunst der Beurteilung),主要被用于政治实践和法律诉讼中;后来被扩展到生活习俗、社会制度、文学艺术、文献编纂等领域。在这里,我们首先讨论“批判”(critique/Kritik)的四种模式。^[4]

第一,文化批判模式(评判的艺术/批评的艺术)。在这里,批判既可以做肯定性理解——评判(包括表扬在内),譬如,文学评论、文学批评意义上的批判,就包括表扬在内;也可以做否定性理解——批评,主要是对某些事物、理论、立场、观点的不认可、否定。从词源学上说,批判与“危机”(crisis/Krise)紧密相关。因而,任何批判都是为了拯救。

第二,内在批判模式(纯粹理性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我们知道,

康德开创了理性批判传统，甚至将批判视为理性的代名词。所谓纯粹理性批判，从肯定意义上理解，是指人们如何有效地认识对象并为这种认识提供某种先验基础；从否定意义上理解，它表明某些理性要求是虚妄的。因而，纯粹理性批判就是纯粹理性的自我认识。黑格尔坚持内在批判模式，将批判等同于否定，但他并未将批判贯彻到底，从而导致了非批判的结果。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断定，黑格尔的“肯定辩证法”最终服务于形而上学的目的。

第三，社会现实批判模式（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批判源于黑格尔，即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批判，包含着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某种程度的坚持，以至于在阿多诺视域里，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并没有根本不同，都是将否定之否定视为肯定的“肯定辩证法”。不过，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构造了一种社会现实批判模式。这毕竟不同于黑格尔，仅仅局限在未能贯彻到底的形而上学内在批判模式。

第四，形而上学批判与社会现实批判相结合模式。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例如，阿多诺将对传统哲学同一性逻辑的批判、对社会现实的合理化原则的批判结合起来，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与M.韦伯的合理化批判结合起来，既坚持形而上学的内在批判，又赋予批判以强烈的现实意义，构造了一种形而上学批判与社会现实批判相结合的模式。

当然，上述关于批判模式的划分，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批判的复杂性，以及批判究竟是什么？并不表明这种划分囊括了一切批判，没有任何例外；也不表明这种划分已经无懈可击，完全能够自洽。实际上，为了揭示什么是批判理论，除考察批判的复杂性外，还要考察什么是“理论”？这需要从“理论”（theory/Theorie）与“实践”（practice/Praxis）关系谈起。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归结为以下四种理解：

第一，理论与实践“异中有同”。在古希腊，实践一词，从广义上说，一般是指有生命物的行为方式。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实践提升为

一个哲学概念。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将人的行为分为三类，即“理论”（θεωρητικά）、“生产”（παράγωγον）、“实践”（πρακτική）。在他看来，生产的目的在于它产生的结果，本身并不构成目的；与实践不同，实践的目的不在自身之外，而在自身之内，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在理论沉思中，人独自面对真理；与实践不同，实践活动总是在人际之间展开。不过，在本身就是目的这一点上，理论与实践又是相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将理论视为最高的实践。简言之，在古希腊，理论是对永恒东西的观察和凝视；而实践的最根本的规定性在于：（1）它本身就是目的；（2）它不是人维持生命的生物活动和生产活动，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伦理行为。^[5]当然，也包括以可变东西为对象的行为。

第二，理论主义取向（用理论“吞噬”实践）。在《后形而上学思维：哲学文集》（1988）中，哈贝马斯说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强大的理论概念。阿多诺认为，尽管康德区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但其理论理性是指纯粹理性，而其实践理性则将去实践化与去对象化结合在一起。“理性的存在者”不是根据质料而是根据形式包含着意志的决定根据，这就是康德的实践“形式主义”。这种理论主义倾向，与主体主义取向联系在一起。

第三，实践主义取向（使理论“屈从于”实践）。在这里，或片面强调实践第一性；或制造实践神话。就前者而言，尽管柯尔施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但在具体论述中有突出实践的嫌疑；至于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则更加明显，尽管他对实践有独特的理解；阿尔都塞强调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即理论实践，表面似乎是抬高理论，但实际上暗含着使理论屈从于实践的倾向。就后者而言，美国实用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实践的片面强调，几乎达到了神话的程度。阿多诺的这种说法，对于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启发意义，却未必完全正确，需要具体分析。

第四，理论与实践“有差异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互独立又不绝

对分离，而是有差异的统一)。例如，阿多诺既反对实践第一性，强调理论批判的重要性；又将理论批判视为一种实践形式，目前甚至是唯一合理的形式——作为一种批判行为，它只能以理论的方式介入实践，否则就像大学生运动那样，变成一种“行动主义”(Aktionismus)、“实践主义”(Praktizismus)、“伪—行动”(pseudo-Aktivität)。^[6]

考察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揭示“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kritischeTheorie)的内涵。所谓批判理论，从广义讲，是指人们对(包括理性在内的)文明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形成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既包括古希腊传统的评判的艺术/批评的艺术在内的文化批判模式；又包括康德传统的纯粹理性批判/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批判模式，更包括马克思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现实批判模式。从狭义讲，特指法兰克福学派“以辩证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社会哲学理论，即形而上学批判与社会现实批判相结合模式。这里的“批判理论”，指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

概括地说，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确定了批判理论基本纲领。C.格律贝格^[7]领导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致力于社会主义史与工人运动史研究，对批判理论构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当然，他为社会研究所规定的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并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真正奠基人霍克海默尔以及所有批判理论家所继承。然而，早在《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1931)^[8]就职演说中，霍克海默尔就力图改变C.格律贝格“重史轻论”的学术路向，并将社会哲学确立为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他认为，社会哲学既不是一种阐释具体社会生活意义的价值哲学，又不是各种实证社会科学成果的综合，而是关于个体与社会关系、文化的意义、共同体形成的基础、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的思想。“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对并非仅仅是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因此，社会哲学主要关心那些只有处于人类

社会生活关系中才能理解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社会哲学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9]在《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1932）“前言”中，霍克海默尔又强调社会哲学研究要与具体科学研究、一般哲学研究、纯粹经验描述、当代形而上学主流精神、世界观和政治考虑区分开来，但要与社会学研究叠合在一起，通过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揭示整个社会、个人心理与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总体上把握整个人类文明。

事实上，霍克海默尔不仅为社会研究所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而且还与马尔库塞一起确定了批判理论基本纲领。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尔，1937）、《哲学与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1937）中，他们认为，“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并非在唯心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这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理性批判理论，而是青年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因而又称为“批判的社会理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例如，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尔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对立：（1）从理论基础看，传统理论是以笛卡尔的《方法谈》（即《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追求真理的方法》，1637）奠立的科学方法论为基础的，它只研究命题之间以及命题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把理论视为外在于社会历史的；而批判理论则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它关注包括人在内的社会整体，并对之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2）从理论性质看，传统理论是超然物外的知识论，是缺乏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顺从主义；而批判理论则是批判社会的激进思想，是具有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批判主义。（3）从理论目标看，传统理论仅仅是在认同、顺从、肯定社会现实中追求知识的增长；而批判理论则在批判、反叛、否定社会现实中追求社会的公正合理，以求得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10]

第二，系统阐发了否定辩证法，试图为早期批判理论奠定规范基

础。早期批判理论到底有没有规范基础？如果有，它是什么？如果没有，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历来是有争议的，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明确：尽管早期社会研究所核心成员^[11]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赞同否定辩证法。从这个角度看，是否可以将否定辩证法视为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否定辩证法”是什么？

众所周知，传统辩证法（不论柏拉图、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认为矛盾双方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认为否定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辩证的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但在阿多诺看来，矛盾就意味着非同一；否定辩证法是一以贯之的非同一性意识。因而，“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摒弃“否定之否定”这个传统辩证法图式，它应该摆脱同一性的还原主义传统，用非同一性原则代替同一性。“改变概念性的方向，使之转向非同一物，这是否定辩证法的关键。”^[12]他认为，任何概念都不能与自身对象完全同一，因为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非概念的东西，即否定自身的非同一的东西。因而，否定辩证法必须努力“通过概念而摆脱概念”^[13]，从根本上清除对概念的崇拜。这样，否定辩证法真正感兴趣的東西，就是黑格尔与传统相一致宣布他们不感兴趣的東西，即非概念的东西、个別的东西、特殊的东西。阿多诺从这种否定辩证法出发，对一切体系哲学、二元论哲学、本体论哲学在内的传统同一性哲学，尤其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ontologie）进行了内在批判；并严厉批判了基础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主体主义和客观主义。当然，“对本体论的批判，并不想走向另一种本体论，即非本体论的本体论。”^[14]因而，否定辩证法既非方法又非实在，而是一种“反体系”^[15]。

那么，这样一种否定辩证法能否成为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呢？笔者认为，否定辩证法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思想，最早肇始于《哲学的现实性》（1931）一文^[16]，经过《理性与革命》（马尔库塞，1941）、《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尔、阿多诺，1947），最终完成于《否定辩证

法》（阿多诺，1966）。因而，否定辩证法是阿多诺对批判理论的最大贡献。事实上，自从《理性之蚀》（霍克海默尔，1946；即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1967）、《启蒙辩证法》以来，早期批判理论家就将“理性”局限于“工具理性”，并对工具理性进行了严厉批判，这就放弃了将理性作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可能。不过，《否定辩证法》使之极端化而已。就是说，否定辩证法以非同一性为理论基础，以反概念、反体系、反传统为基本特征，以“被规定的否定”（bestimmte Negation）为核心，最终陷入了“瓦解的逻辑”^[17]。从这个意义上说，否定辩证法不仅不是、反而解构了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并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18]这样说来，哈贝马斯、霍耐特、S.本哈比（Seyla Benhabib）等人的看法就是有根据的。他们认为，早期批判理论的缺陷之一，就是规范基础缺乏理论论证，或者说根本缺乏规范基础。于是，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就成为阿多诺之后批判理论家急于解决的问题，哈贝马斯是如此，维尔默也不例外。

第三，全方位批判现代工业文明，使批判理论系统化并加以运用。

（1）启蒙理性批判。《启蒙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就是试图阐释：为什么在科学技术进步、工业文明发展似乎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时候，在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时候，“人们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而是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19]？在这里，霍克海默尔、阿多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不仅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过程；而且阐明了启蒙精神的实现过程，就是进步与倒退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生的过程。因此霍克海默尔、阿多诺断定，启蒙精神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那么，启蒙理性批判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批判？哈贝马斯说，《启蒙辩证法》“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20]。所以，启蒙理性批判是一种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批判。但霍耐特指出，在《启蒙辩证

法》中，霍克海默尔、阿多诺从自然史而非社会史出发重构欧洲文明过程。^[21]因而，启蒙理性批判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批判，而是一种自然支配模型批判，一种开放的社会批判，其中贯穿着病理学诊断。维尔默认为，《启蒙辩证法》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试图把两个互不相容的传统，即启蒙理性批判传统与资本主义批判传统融合在一起。^[22]

在笔者看来，所谓启蒙理性，就是一种以征服、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科学知识万能、技术理性至上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历史进步为目标的文明乐观主义。简言之，启蒙理性的核心价值就是，技术理性主义、个体中心主义、文明进步主义。因而，对启蒙理性批判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一，这个批判直接针对启蒙理性，但实际指向工业文明，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不过，需要纠正一个流传甚广的误读，即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科学技术、否定理性，甚至否定文明本身。事实上，他们只是想矫正科学技术滥用、工具理性膨胀带来的工业文明弊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情绪化和片面化倾向。其二，需要纠正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即法兰克福学派只是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不太注重经济分析。事实上，尽管早期批判理论确实是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为核心，但并没有忽视、反而比较重视经济学分析。按照霍耐特的理解，在早期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框架中，经济学解释模型、社会心理学解释模型、文化理论解释模型是相互补充的。^[23]其三，这个批判核心在于对技术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进步主义的批判。尽管它是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悲观主义文化批判，但这种批判性反思是发人深省的，实际上是对工具理性霸权、价值理性被贬抑的强烈抗议。这种批判立场，上承卢梭等人的浪漫主义、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卢卡奇等人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下续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因而可以说，无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史上，它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 文化工业批判。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否定性批判倾向占据支配地位，这在阿多诺那里表现得尤

为突出。在《启蒙辩证法》第二部分，即《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阿多诺指出，一切文化工业都是相似的，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看，文化工业都表现出齐一性，从而使个性成为虚假的；文化工业产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只注重经济效益，并导致人格异化；文化工业通过广告诱导消费者，并通过娱乐活动或不断地向消费者许诺公开欺骗消费者。总之，“整个世界都经过了文化工业的过滤”^[24]。

到《再论文化工业》（1963）^[25]中，尽管阿多诺有限度地承认文化工业的作用，但仍然像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一样，强调必须用“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代替“大众文化”（Massenkultur）概念，因为文化工业并不是从大众自身中自发成长起来的、服务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也不是大众艺术的当代形态，而是为大众消费量身定制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消费本身的文化工业产品；是技术化、标准化、商品化的娱乐工业体系；具有重复性、齐一性、欺骗性、辩护性、强制性特征；本质上是为了经济利益（即利润）人为制造出来的。因而，它试图通过人为刺激的虚假消费满足给人们带来虚假幸福，最终成为了一种消除人的反叛意识、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从而阻碍了个性形成发展和人的解放。由此可见，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态度总体上是否定的。尽管这种批判有过激和片面之嫌，但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无疑是阿多诺对批判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不仅是对西方文化危机振聋发聩的反思，而且对当代文化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3）压抑性文明批判。像霍克海默尔、阿多诺一样，马尔库塞也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在《爱欲与文明》（1955）、《单向度的人》（1964）等著作中指出，文明产生于“基本压抑”（basic repression），即为了维持文明延续而不得不对性本能进行的必要压抑；工业文明产生于“额外压抑”（surplusrepression），即为了使文明永续而对性本能进行的附加压抑。这样，工业文明就是一种压抑性文明，而发达工业文明则是压抑性文明的顶峰。因为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文明不断发展；但文明发展必然伴随着沉重的代价。就是说，文明发展并没有给人们带

来自自由和幸福，而是带来了全面压抑和精神痛苦。可悲的是，人们在物质享受的虚假满足中，丧失了痛苦意识而充满了幸福意识，心甘情愿地成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然而，尽管“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升华了的奴隶，但他们仍然是奴隶”^[26]。

与霍克海默尔、阿多诺的悲观态度不同，马尔库塞试图在改造弗洛伊德压抑性文明论基础上重建非压抑性文明。为了重建非压抑性文明，必须重建新文明观念，确立新文明目标。为此目的：一是要超越现实原则，重建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关系，协调感性力量与理性力量的关系；二是要将工作转变为游戏，消除一切异化劳动和异化现象。三是要将性欲转变为爱欲，重建爱欲与文明的关系，通过性文化革命改变现存社会秩序，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实现非压抑性升华。当然，重建非压抑性文明并不意味着回归原始自然状态，而是寄希望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可见，马尔库塞对待未来文明的态度是相对乐观的，但最终没有摆脱悲观主义结局：“批判的社会理论并不拥有能够消除当代与未来之间鸿沟的概念；它不承诺任何东西，不显示任何效果，它保留的只是否定。因而，它想忠诚于那些自身生活毫无希望，正在和将要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27]

尽管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文明的批判有过激之嫌，但他不仅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某些新特点，而且提出了某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与合理的见解。正如李小兵所说，作为反潮流的思想家，马尔库塞的思想是偏激的，其思想中的空想成分俯拾皆是；但他捍卫知识价值、艺术价值、精神价值、人的价值。“马尔库塞的思想，表现出他作为当代思想家的独创个性：不是社会现实的建设者和辩护者，也不是人类原初精神家园的追忆者和眷恋者（像他的先师海德格尔那样）。毋宁说，马尔库塞是一位面向未来的预言家。”^[28]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性文明论是一种爱欲解放论。尽管马尔库塞极力反对将它理解为性解放论，但它对性解放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它试图通过性文化革命反叛现存社会秩序也具有空想性。不过，马尔库塞的非压

抑性文明论，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压抑性文明批判为核心，以重建非压抑性文明、实现人的爱欲解放为目标，尤其是重建感性与理性关系、爱欲与文明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构想，对于克服工业文明弊端，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从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

概括地说，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这是阿多诺之后的批判理论家首先要做的事情，哈贝马斯可谓开风气之先。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学术访谈中，当霍耐特等人问到“早期批判理论的不足之处在哪里？”时，哈贝马斯回答说，早期批判理论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一是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而没有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经验分析，由此陷入了抽象的文化哲学批判之中，从而使批判理论缺乏规范基础。二是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不能真正把握理性的涵义。三是未能认真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不能客观地评价“后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29]社会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总之，早期批判理论仍然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根据，始终未跳出主体哲学窠臼。然而，运用主体哲学范式反思现代文明问题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所以，需要转变哲学范式：从侧重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主体哲学”，转向侧重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从传统批判理论转向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创立交往行为理论，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早期批判理论家试图修正马克思的某些预测，但并没有打算彻底告别马克思。当然，流亡经历肯定影响了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就像德国政治哲学家H.杜比尔（Helmut Dubiel）所说，20世纪30年代，他们还从历史